

長時間災難暴露下創傷經驗之探討—— 以八八水災佳冬災區為例

洪雅琴

(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言

全球氣候變遷與災難型態的改變，已經影響到我們對災難的認識，以及對人類災難經驗變遷的分析與探究。從2010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的八八水災對南台灣所造成的重創，到2011年那凡比颱風造成大高雄地區前所未有的嚴重淹水景象、梅姬颱風重創宜蘭、蘇澳地區等，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颱風帶來的水災災難，使多數民眾聞颱風色變，惟恐身家性命財產不保。這兩三年來，台灣重大水災災難特徵包括了：1.災難重複發生；2.災難暴露時間長；3.受災範圍廣大；4.土石流造成嚴重死傷；5.災後重建或遷移不易等。過去颱風造成的水災災難雖然經常發生，也沒有如此嚴重過。近年來台灣水災災難問題急遽惡化，水災災難創傷問題日益嚴重，咎其原因，除了極端氣候因素之外，也牽涉到超限利用或管理疏失等人為因素。整體來說，台灣的水災災難性質與型態已經改變，對本島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構成了持續性的威脅。

八八水災發生之前，1999年的921地震可謂國內最嚴重的災難創傷，累積的災難創傷研究也最完善；然而，地震

災難和水災災難特徵上有諸多不同之處，最顯著的特徵差異是災難暴露時間的長短不同，921地震災難於瞬間發生與結束，但卻帶來嚴重死傷的情形，是屬於偶發性、一次性的大型災難。以八八水災佳冬災區的情形來說，災民雖倖免於滅頂，但多數暴露於水災災難現場長達兩、三天時間；隨著水災災難暴露時間的拉長，災難暴露下創傷經驗之多元變異現象也愈加顯著。吳英璋與許文耀（2004）提到：台灣近年來災難不斷，因此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參與探討，對不同災難事件是否具有相同或相異的心理反應歷程進行瞭解。現今台灣的水災災難性質與型態已經不同於以往，我們有必要檢討是否適合將過去的災難創傷理論，直接套用在當今水災災難創傷經驗與現象的理解上？筆者認為我們需要考察既有的國內外災難創傷理論，並針對水災災難的不同之處進行討論，以便理解當今的水災災難創傷經驗與現象，作為未來建立水災災難創傷理論的論述基礎。

貳、長時間災難暴露下創傷經驗的多元異質性

暴露在災難下的創傷經驗被認為是

引起後續心理病理問題的危險因子，特別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吳英璋、許文耀，2004; Freedy, Shaw, Jarrtell & Masters, 1992; Mueser, et al., 1998, Neria, Bromet, & Sievers, 2002）。其中，Freedy等人提出多變危險因子模式在災難創傷研究領域中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該模式將影響災難受創者的心理反應因子分為：(1)災難前因子：性別、年齡、過去是否遭遇過災難事件、先存的資源等；(2)災難當下因子：災難暴露程度及對災難的主觀感受；(3)災難後因子：次級壓力源、因應方式、社會支持及資源流失。許多學者認為Freedy等人對災難暴露與創傷經驗的「劑量—效果」關係概念界定過於簡化，忽略了災難、創傷事件、家庭、社區以及生態等環境的衝擊，並認為創傷暴露指標應包含以下：(1)災難當下主觀覺知生命受威脅程度；(2)災難當下經驗到具生命威脅的客觀事實，如自己受傷或目睹他人受傷或死亡；(3)災難後的損失與破壞，包括財產的損失，家園與生活作息的變動（吳英璋、許文耀，2004；洪福建，2003；Chen, Lin, Tseng, & Wu, 2002; Vernberg, La Greca, Silverman, & Prinstein, 1996），上述概念視框有助於掌握創傷暴露的實質內涵。以八八水災佳冬地區的特殊屬性來說，所謂「災難當下因子」的災難暴露時間是漫長的，傷害或死亡的威脅等身心受創過程也是持續進行的，同時間「災難後因子」如次級壓力源、因應方式，社會支持與資源流失等重要變因的影響過程也開始出現，事實上，在長時間的災難暴露過程中，災難當下因子與災難後因子這兩者

之間是先後發生、交互影響的關係。

Benight與McFarlane(2007)強調近來發展的災難研究理論架構需要被批判和挑戰，幾個重要理論應可作為進一步發展災難研究的起點視框，他們並提醒後續研究能關注「時間框架」議題，了解隨著時間變化的創傷復原現象，以調整適當的救災政策。水災隨著災難暴露的時間拉長，災難暴露之下的創傷經驗與歷程會開始產生質的變化，是一種動態的異質性經驗與歷程。吳英璋與許文耀（2004）強調災難與創傷事件後的反應是多層面的，對於災難與心理衛生相關議題的探討，應兼顧災難對人的負向與正向反應經驗的掌握；因為災難可能造成個體持續的功能惡化，或者也有可能變得更加地成熟適應(O'Leary, 1998)。

以八八水災佳冬災區為例，災民在長時間水災暴露歷程中遭遇到孤立的經驗、身心需求的剝奪、瀕臨死亡的恐懼與想像等被剝奪和創傷經驗的增生；但也同時有人與人之間相互支持、陪伴的成長經驗。災民的災難當下因子是海水在清晨七點多的短短十幾分鐘內無預警地淹至一至兩層樓高，災民經歷了死裡逃生，住家和大海連成一片的恐怖經驗。在國軍陸續將災民救出之前，佳冬災民長達兩、三天的時間持續暴露於災難處境，由於缺乏飲水、食物、禦寒衣物和醫療通訊等基本民生物資，災民的身心需求遭受嚴重剝奪和傷害。在這長達兩、三天的災難暴露過程中，災民可能因為突然不必煮飯、上學、上班等，而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理路，卻多出了需要緊急因應的危機處境，也因此遭遇到過去從未經歷過的人際互動經驗。亦

即，災民的心智狀態和身體並非維持一種靜止不動的狀態，相反的，災民必須不斷主動思考、想像和因應所有可預期與不可預期的危機險境，設法採取行動自救救人，進而尋求人際連結和資源網絡，以便存活下來。一如吳英璋（2009）所提到：災難是非預期的巨大心理壓力，對當事人的生命帶來難以抵禦的、全面性（生理、心理、心靈、環境、生活、生計、休閒等）的衝擊，任何一個層面裡的任何一個部份受到衝擊，產生變化，將連帶的引起整個有形與無形的結構變化，對人們的心理健康有著嚴重的影響。長時間的水災災難暴露創傷經驗更是無法用簡單的「劑量—效果」關係構念來加以計算，而需要考慮到長時間災難暴露的創傷經驗本質上是多向度的、多層次的和交疊性的，因此，揭露長時間災難暴露過程中不同質感變異之創傷經驗，有其重要性。

參、災難創傷理論典範的融合

前述筆者提到我們需要考察既有的國、內外災難創傷理論，並針對水災災難的不同之處進行討論，以便於理解當今的水災災難創傷經驗與現象。在此，筆者將學者提出的災難創傷的重要理論概念與假設分類為「災難創傷增生理論」與「災難創傷剝奪理論」兩大範疇；筆者認為災難創傷的「增生經驗」與「剝奪經驗」這兩者的交織，大抵形構成受創者災難創傷經驗的內涵與形貌。另外，筆者也將討論有關災難創傷下心理復原的重要元素與概念：復原

力，探討暴露在災難過程中的個體其內在控制感與恢復能力。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災難創傷的增生理論

災難創傷「增生理論」聚焦於災難受創者在災難創傷暴露過程中，增加了個體內在原本沒有的新經驗，例如：八八水災的瀕死經驗，淹水的感官知覺與記憶等，甚而在災後出現特定的創傷後壓力反應或症狀。該理論概念反映了災難當事人創傷經驗的增生，但創傷記憶受到扭曲，造成受創者過去與現在、現實與恐懼之間距離被消融的現象。例如Brewin、Dalgleish及Joseph(1996)提出PTSD的雙重記憶表徵，該理論主張創傷記憶在PTSD的發展上佔有關鍵地位，患者的核心症狀常涉及創傷事件的異常記憶表現，如創傷影像覆返或無法記得重要部分。患者的創傷記憶通常以感官記憶（如視覺、聽覺與氣味成分等）為主，容易受創傷相關刺激活化，且部分內容無法經由語文途徑提取。Dalgleish(2004)提出雙重或多重認知表徵PTSD理論則是類似的概念，Tedeschi與Calhoun(1995)則認為上述現象造成了患者創傷記憶侵入與抑制並存的矛盾現象。以Foa為主的學者群則提出了：恐懼記憶網路(fear network)概念，亦即創傷事件會在個體的長期記憶中形成一組連結網路(Foa, Ehler, Clark, Tolin, & Orsillo, 1999; Foa, Steketee, & Rothbaum, 1989)。Tolin與Foa(2002)認為人類所擁有的害怕機制是一種以記憶為基礎的生存機制，PTSD即是一種病態的害怕機制，此一機制可能記憶了過當的反應強

度、刺激與刺激之間不真實的連結，刺激與意義間錯誤的連結，以及刺激與反應機制的不當連結。針對上述現象，國內學者也陸續提出類似概念，如提出「（複雜的情緒團）」（吳英璋、許文耀，2004），以及「災難心理輻射」（李維庭，2000）等。

二、災難創傷的剝奪理論

災難創傷「剝奪理論」論述多聚焦於重大災難創傷暴露之下，正常生活脈絡與身心需求的剝奪與匱乏；以及災民內在、外在能力資源與社會支持的流失，進而探討受創者的壓力調適與心理重建過程等。重要的創傷剝奪理論有資源保留(COR)理論(Hobfoll, Dunahoo, & Monnier, 1995)、素質壓力模式(Abramson, Alloy, & Metalsky, 1988)、危機緩衝理論(Weisaeth, 1996)、社會支持衰退模式(Norris & Kaniasty, 1996)等。上述諸多理論之中，以Hobfoll等人(1995)的資源保留理論受到國內、外學者最多重視和引用；而Norris與Kaniasty(1996)提出的社會支持衰退模式，雖然也是知名的災難創傷重建的重要理論之一，但該理論主要以災難後因子中社會支持要求與動員的衰退歷程現象為主，與本文長時間災難暴露的研究焦點相距較遠。

災難創傷的素質壓力模式認為災難創傷是災民經歷災難暴露之後，個體先前的脆弱因子（如先天的易感受性）和災難環境壓力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負向結果。而危機緩衝理論則提出負向「危險因子」和正向「保護因子」一起作用之下，災民的災難創傷可能得以獲

得緩衝。上述兩者理論視框均認為人類的災難適應成功與否，端視個體是否有前置的脆弱體質以及個體對環境挑戰做出反應的能力強度而定(Benight & McFarlane, 2007; Weisaeth, 1996)。Hobfoll等人(1995)提出的資源保留理論強調社會心理與人際資源流失對災民的打擊更甚於外在客觀資源的流失，該觀點和前兩大理論的觀點是相互呼應的。Hobfoll等人將資源分為四種，分別是物體資源（如房屋、車、衣物等）、條件資源（如婚姻關係、工作等）、個人資源（如自尊、能力等）、能量資源（如金錢、保險等），當面對災難時，個體將進行一連串獲取、保存及保護自己資源的反應，藉以支撐個人及家庭，而資源的流失將影響其心理健康。當災民評估其資源流失愈多，則災後的身心反應將愈差。Smith與Freedy(2000)以COR理論對水災災難進行實徵研究，結果顯示水災災難暴露和社會心理資源流失的關聯性，災民社會心理資源的流失是水災災難暴露中心理壓力與生理症狀之間的中介變項。水災暴露過程中常見的失落經驗有日常生活的失落、失去控制感和樂觀性，失落待完成的目標以及和所愛的人相處的時光等。國內災難學者許文耀引用COR理論於多篇九二一地震災難創傷的實證研究上，並得到支持的結果；研究顯示災民表面上遭遇到的困頓是經濟資源的流失，但真正喪失的是個人克服困境的能耐，以及個人生活目標的喪失（許文耀，2003；許文耀、曾幼涵，2003）。

三、個體在災難處境中的復原能力

Bonanno(2004)定義復原力(resilience)為個體內在穩定的健康功能，生成經驗與正向情緒的能力。復原力的概念源自於學者在戰後軍人適應研究中，發現部分軍人並未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McCubbin & McCubbin, 1988; Patterson, 2002)，這些發現導引學者超越傳統PTSD創傷記憶缺損的病理學觀點，而轉向積極正向的災難因應與適應能力特質的思考框架，並促成健康心理學的新典範(Coleman & Ganong, 2002; Patterson, 2002)，國內在921地震之後對復原力的研究風潮方興未艾(曾文志，2006，2007；蔡素妙，2004；蕭文，2000；2001)。我們從921地震災後重建經驗中瞭解到，「受災」與「重建」乃為一體之兩面。人既可能是災難的受害者，完全被動與無力，部分災民在災後半年至一年之後可能發展出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是人也是主動的組織者與行動者，展現其復原能力與生命韌性。回到心理學家所關注的焦點，則仍是個體的受災經驗與心理重建歷程，此其構成了災難心理衛生的內涵(Myers, 1994)。對災難倖存者而言，災難衝擊以及安置和重建等歷程與心理內涵，它既屬於過去的經驗，也是現在正在經歷的事件，並包括對未來的計畫和想像。相對於復原力概念對災難前因子中個體內在特質與體質能力的重視，Norris與Kaniasty(1996)提到社會支持的重要性，並認為社會支持緩衝了災難創傷作用，並提升了個體處理環境要求的自我效能

感。此外，災難處遇的社會認知理論強調的是個人與社區在災難創傷與復原過程中的主動角色與影響力，所謂災難創傷並非災難的環境因素作用於個人脆弱體質的被動靜止觀點。社會認知論認為個體的災難適應取決於對環境、人際互動與行為因素的交互作用，它被視為災難適應的一種中介模式(Benight & Bandura, 2004)。

肆、災難創傷知識典範的轉移

一、災難暴露研究的挑戰性

一般天災人禍的災難創傷暴露時間極短，受創者生命財產的威脅與損失卻極為巨大，也許災難創傷暴露的經驗過於駭人，許多受創者甚至無法清楚回憶該過程與經驗，在這樣的困難與限制之下，使得受創者的災難暴露經驗不容易研究。多篇創傷研究顯示：災難受創者極力防衛迴避其災難創傷暴露經驗的相關記憶，使其被潛抑為麻木狀態，但是該災難創傷暴露經驗本身卻同時以大量夢魘和視覺記憶閃現(flashbacks)的型式，干擾著受創者的生活適應(蘇逸人、陳淑惠，2008；Brewin & Holmes, 2003; Ehlers & Clark, 2000)。以國內921地震災難創傷的研究發展為例，依吳英璋與許文耀(2004)整理921地震之後三年的創傷後壓力反應指標與前災難因子、災難當下因子與後災難因子之間的關係，比較結果發現：國內學者聚焦於以災難暴露影響為主的災難當下因子研究顯著比其他兩者少很多。有可能是地震災害對生命財產威脅與創傷嚴

重；或因地震的災難當下因子時間短暫，災民能否即時逃生或不幸罹難，往往發生在短暫幾秒鐘或數分鐘之內發生的，使得以災難暴露程度為主的災難當下因子難以進行研究，相較於其他兩個災難因子而言，不易獲得災難創傷領域學者的研究興趣。由於災難暴露下的創傷經驗是災難受創者與一般人之間主要的差別之處，如何與災難暴露經驗正面交鋒，探究災難受創者災難創傷暴露經驗的核心內涵，實屬災難創傷研究領域亟欲進一步釐清的重要議題。

二、質化研究的顯要性

Aldwin(1994)主張災難創傷經驗重現乃生理反應、情緒反應與認知行為反應之間的交互影響模式，而非線性的「某種過程為因，某種過程為果」的影響歷程，同時也非某種歷程影響了另一歷程，而另一歷程又倒過來影響該歷程的互動模式。筆者將之界定為一種複雜交織的多元異質經驗與歷程。吳英璋與許文耀（2004）基本上同意Aldwin的觀點，但也坦言因受限於量化研究工具的限制，其研究架構僅是擷取複雜創傷經驗之中的認知面向進行歷程化分析，進而建立其災難創傷的因果模式或互動模式。因為量化研究所擅長的是在認知行為研究典範之下主動理性的訊息處理過程與反應機制受損的模式，並在模式內檢驗各個徑路。亦即從刺激到反應之間會有一個訊息處理過程，它基本上還是屬於單線模式。但是，所謂的災難創傷記憶是以視覺影像記憶為主的感官記憶，它事實上已經超出了認知的過程(Brewin, et al., 1996)。蘇逸人與陳淑惠

(2008)的研究也發現：因創傷有大量的感官視覺記憶無法透過以主動回憶書寫的問卷型式來獲得，他們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口語描述創傷經驗，以補足量化研究的不足之處。筆者在八八水災佳冬災區追蹤關懷與訪談過程中發現：災後一個月與災後一年災民在回溯訪談災難暴露受創過程與經驗描述時，多數災民的口語表達是鮮活的，情緒是激動的，通常會伴隨著驚恐的表情、語氣，或流下眼淚等，災難暴露的回溯過程就像是一種經驗的活化與再現。上述經驗可以佐證蘇逸人與陳淑惠的觀點；也支持學界採用質性研究的田野參與觀察，並輔以半結構的回溯訪談資料分析，來捕捉災民對長時間災難暴露下創傷經驗的口語與感官記憶。

三、從認知行為典範到現象學的存在典範

在長時間災難暴露的創傷過程中，人們不僅經歷了災難的威脅和瀕死的恐懼，同時也經歷了人與人之間的責任、承諾與感動等原初狀態的群體歷程。例如：八八水災佳冬災區有許多災民除了經歷到恐慌、瀕死的經驗之外，也同時經歷到被神明庇佑、親友安撫的經驗；災民經歷創傷的過程，也同時具體化其社區經驗。長時間的災難暴露對災民所造成的影響，乃個體與災難本身，個體與他人、群體與社區之間複雜交疊的經驗與歷程。這樣多重交疊的創傷經驗與歷程，我們無法僅以實證認知模式來探究，因為如此很多東西將會太快被假定；同時，在認知行為研究典範之下，無法解釋有些災民在創傷復原過程中所

體驗到的靈性經驗。因此，筆者認為透過民族誌的俗民方法論的田野訪談過程獲取災民對該經驗之回溯，格外有助於掌握災民社區經驗的多元豐富性。由於半結構的訪談無法使用固定的模式，它本身已經脫離心理病理學的模式；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位移到另一個知識典範：存在的典範，藉此表明人和世界的多層次交接經驗，並藉由現象學研究方法對災民個別經驗進行深度分析。

伍、八八水災佳冬災民災難創傷的多元異質性

八八水災佳冬地區的災難暴露創傷經驗的顯著性，在於災民幾十年來一直生活在淹水的場景和結構之中，它並不是八八水災才淹水的。它是全台灣地層下陷最嚴重、地勢最低窪，每年逢颱必淹的地方。Benight與McFarlane(2007)強調2005年南亞海嘯和卡崔娜颶風的例子，提醒了我們了解災難事件時，不忘考量災區的歷史與社區脈絡；災難發生前的社會政治與個體脆弱體質或能力條件均是重要的脈絡。同樣的，在探討八八水災佳冬災區長時間水災災難暴露經驗時，不能單就災民個別能力條件以及內在心理反應機制進行瞭解；還需要將佳冬地區以養殖漁業為主的社會經濟脈絡與歷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納入考慮。如此所獲致的長時間災難暴露的創傷經驗與相關知識，可以幫助我們回過頭來修正原來的災難創傷暴露理論，讓災難創傷暴露的理論概念更完備，作為未來長時間災難暴露之下的救災工作與心理衛生介入的重要基礎。

八八水災受災情形嚴重的地區之一

為屏東縣佳冬鄉沿海低窪地區，包括塭豐、塭焰與羌園等村。該地區以養殖漁業為主，長年超抽地下水使得地層下陷嚴重程度居全國之冠，地勢低於海平面。過去颱風季節經常淹水至膝蓋左右。八八水災當天早上七點多因豪雨加上堤防潰堤，無預警的在短短十幾分鐘內水淹到災民住屋的一樓頂或二樓，許多災民經歷死裡逃生的恐怖經驗，舉目災區住家和大海連成一片，災民多數逃到自家或鄰居的二樓或頂樓等待救援。長達兩、三天的時間多數災民處於缺乏食物、飲水、醫療通訊等基本民生物資的災難暴露處境之中，基本身心需求嚴重受到剝奪，而處境岌岌可危。待國軍陸續將災民救出之後，災民一開始暫時被安置於佳冬鄉公所，後輾轉安置於佳冬農校，最後由加祿堂營區收容，人數約一千多人。安置期間多數災民利用白天返回家園清理打掃，並於中秋節前後陸續返回家園。災區一樓民宅的主要家具、電器以及汽機車流失毀損，財物損失估計每戶約30萬至60萬左右（田野日誌，20090919），多數災民返家之後家徒四壁，必須重頭開始建立家園的實體設施，由於多數災民原本即屬於經濟弱勢家庭，政府與民間機構補助額約十餘萬元，並不敷使用（田野日誌，20090919）。原本經濟富裕的魚塭業主則屬災區的少數人口，且多數並未居住於當地，業主因為魚塭種魚、魚苗等流失，財務損失以數百萬、千萬計算，非常驚人。災區許多災民從事魚塭工，也因此失業，因此資源流失、財務損失與失業是佳冬災民最主要的壓力來源。

佳冬沿海地區村民之中，男性一般

從事漁業工作，諳水性，能免於滅頂、並具備第一線的救災能力；多數老弱婦孺則只僅能逃至自家或鄰近安全處，等待救援。同樣經歷八八水災，海堤被沖毀，短短十餘分鐘內水淹及一樓頂到二樓高度的凶險處境，災民個體的脆弱體質與條件差異直接影響到災民對水災災難創傷暴露程度的主觀認定，例如：災民住家的地勢高或低，住家為平房或樓房，災民會不會游泳，自家是否備有竹筏，是否有儲備糧食飲水、是否熟悉地勢、身體的老弱殘疾與否，救援人力物資是否容易抵達等，而這也是水災災難創傷暴露構成條件的獨特之處。以筆者兩年多以來在佳冬災區的田野工作最熟悉的塹豐村來說，該村近三分之一的村民居住於平房，八八水災對他們而言意味著瞬間滅頂的可怕災難，他們需即刻逃離家門，尋求鄰近親友樓房或廟宇、小學等庇護，所有身家財產瞬間幾乎化為烏有。然而，其他有二、三樓住屋的災民，他們滅頂的風險較低，但驚恐的程度不見得較低。

Freedy等人(1992)指出災難暴露造成的生命威脅與財物破壞越嚴重，受創者的災後壓力症候與身心狀況越糟糕，存有「劑量—效果」的關係。該概念簡單易懂，也獲得許多災難創傷學者的認同(Elal & Slade, 2005; Ursano, Fullerton, & McCaughey, 1994)。根據Freedy等人的概念視框，災難暴露經驗被認定為等同於創傷經驗，同時被視為一種危險因子，是有害個體身心健康的；並且隨著暴露時間越久，傷害也就越大。上述概念剛好可以作為理解八八水災佳冬災區長時間災難暴露經驗探究上的一個起點

視框。然而，隨著水災災難暴露的時間拉長，意味著災難暴露創傷的「劑量—效果」關係，多了一種時間性因素的參照與影響，個體除了面對死亡的威脅、災難衝擊以及與不確定性，還有其他經驗內涵需要加以考慮。尤其是我們不能忽略了人在長時間的災難暴露受創歷程中，仍具有相當程度的能動性與主體性。以筆者2011年觀察訪談八八水災佳冬地區災民為例，長達兩、三天的水災災難暴露經驗不一定完全等同於創傷暴露經驗；例如：「廟婆同時面臨瀕死的恐懼經驗以及受到神明庇佑的經驗；玉來阿嬤則是先經歷受困，之後被孫子救出，進而挺身保護兩個孫子並能救助鄰人等經驗（田野日誌，20100807）。」佳冬災民長時間的災難暴露是一段複雜的過程和經驗，隨著加進來的時間因素，災民同時有負向與正向經驗交織發生著，災民除了被剝奪與創傷經驗之外，同時也可能有正向資源與力量的運作和發揮。同時，我們不能忘記人基本上是從屬於群體生活的，在長時間的水災災難暴露過程中，群體中的人我互動關係仍持續進行中。

陸、結語

台灣因超限利用造成地層下陷、國土流失問題處處可見，其中佳冬災區首當其衝，八八水災佳冬災區的災情與傷害正是大自然反撲的負面教材，而災區弱勢者更是承受最大的創傷和代價。期待本文對於長時間水災暴露下災難創傷現象的知識與實務面的對話與反思，可提供災後社區與災民心理重建的參考；並為國內未來隨時可能發生水災災難的

心理救災與災後心理重建工作預作準備。

參考文獻

李維庭（2000）。經歷九二一：災民安置所的心理重建經驗。**應用心理學研究**，**6**，213-250。

吳英璋（2009）。**心理的復（重）建與心靈的復（重）建**。2009年12月15日，取自全國921災後心理輔導與諮商資訊網：<http://921.heart.net.tw/921symposia1.shtml>。

吳英璋、許文耀（2004）。災難心理反應及其影響因子的文獻探討。**臨床心理學刊**，**1(2)**，85-96。

洪福建（2003）。**921震災受創者災後身心反應之變動與維持：災後環境壓力、因應資源與因應歷程的追蹤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許文耀（2003）。資源流失、因應、社會支持與九二一地震災民的心理症狀之關係。**中華心理學刊**，**45(3)**，263-277。

許文耀、曾幼涵（2003）。九二一地震後災民的資源變化與心理症狀間的關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6(2)**，1-19。

曾文志（2006）。復原力保護因子效果概化之統合分析。**諮商輔導學報**，**14**，1-35。

曾文志（2007）。大一學生歷經創傷事件與復原力模式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2)**，317-334。

蔡素妙（2004）。地震受創家庭復原力之研究——以九二一為例。**中華人**

文社會學報，**1**，122-145。

蕭文（2000）。災難事件前的前置因素與復原力在創傷後壓力症候反應心理復健上的影響。九二一震災心理復健學術研討論文集，32-40。

蕭文（2001）。復原力概念及在輔導上的應用。華人輔導知能研討會手冊。新加坡。

蘇逸人、陳淑惠（2008）。負向信念預測創傷後壓力症狀之三個月追蹤研究：創傷記憶特性的中介角色。**中華心理學刊**，**50(2)**，167-186。

Abramson, L. Y., Alloy, L. B., & Metalsky, G. I. (1988). The cognitive diathesis-stress theories of depression: Toward an adequate evaluation of the theories' validities. In L. B. Alloy (Ed.), *Cognitive processes in depression* (pp. 3-30). New York: Guilford.

Aldwin, C. M. (1994). Transformational coping. In C. M. Aldwin (Ed.), *Stress, Coping, and Development* (pp.240-269). New York: Guilford.

Benight, C. C. & Bandura, A. (2004).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posttraumatic recovery: The role of perceived self-efficacy.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42**, 1129-1148.

Benight, C. C. & McFarlane, A. C. (2007). Challenges for disaster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for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disaster mental health studies.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12**, 419-434.

Bonanno, G. A. (2004). Loss, Trauma, and Human Resilience: Have We

- Underestimated the Human Capacity to Thrive After Extremely Aversive Ev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 (1), 20-28.
- Brewin, C. R., Dalgleish, T., & Joseph, S. (1996). A du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 670-686.
- Brewin, C. R. & Holmes, E. A. (2003).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sychological Review*, *23*, 339-376.
- Chen, S. H., Lin, Y. H., Tseng, H. M., & Wu, Y. C. (2002).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ne year after the 1999 Taiwan Chi-Chi earthquak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25*, 597-608.
- Coleman, M., & Gonong, L. (2002). Resilience and families. *Family Relations*, *51*, 101-102.
- Dalgleish (2004).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evolution of multirepresentational theoriz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 228-260.
- Ehlers, A., & Clark, D. M. (2000). A cognitive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39*, 319-345.
- Elal & Slade (2005). Traumatic Exposure Severity Scale (TESS): A Measure of Exposure to Major Disaster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8*(3), 213-220.
- Foa, E. B., Ehler, A., Clark, D. M., Tolin, D. F., & Orsillo, S. M. (1999). The Posttraumatic Cognition Inventory (PTCI):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1*, 303-314.
- Foa, E. B., Steketee, G., & Rothbaum, B. O. (1989). Behavioral/cogni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r Therapy*, *20*, 155-176.
- Freedy, J. R., Shaw, D.L., Jarrtell, M. P., & Masters, C. R. (1992). Towards and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 applic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stress model.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5*, 441-454.
- Hobfoll, S. E., Dunahoo, C. A., & Monnier, J. (1995).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nd traumatic stress. In J. R. Freedy & S. E. Hobfoll (Eds.), *Traumatic stres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 McCubbin, H. I., & McCubbin, M. A. (1988). Typologies of resilient families: Emerging roles of social class and ethnicity. *Family Relations*, *37*, 247-254.
- Mueser, K. T., Goodman, L. B., Trumbetta, S. L., Rosenberg, S. D., Osher, F. C., Vidaver, R., et al. (1998). Trauma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severe mental illnes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6*, 493-499.
- Myers, D. (1994). Disaster response and recovery: *A handbook of mental*

- health professionals*. California: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
- Neria, Y., Bromet, E. J., & Sievers, S. (2002). Trauma exposur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psychosis: Findings from a first-admission cohor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0*, 246-251.
- Norris, F. H., & Kaniasty, K. (1996). Received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times of stress: A test of the social support deterioration deterrence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498-511.
- O'Leary, V. E. (1998). Strength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Individual and social thriv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4*, 425-446.
- Patterson, J. M. (2002). Integration family resilience and family stress theo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349-360.
- Smith, B. W. & Freedy, J. R. (2000). Psychosocial Resource Loss as a Mediator of the Effects of Flood Exposure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Symptom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3*(2), 349-357.
-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5).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Growing in the aftermath of suffering*. Thousand Oak, CA, US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Tolin, D.E., & Foa, E.B. (2002). Gender and PTSD: A cognitive model. In R. Kimmerling, P. Ouimette, & J.Wolfe (Eds.), *Gender and PTS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Ursano, R.J., Fullerton, C.S., & McCaughey, B.G. (1994). Trauma and disaster. In R.J. Ursano, B.G. McCaughey, & C.S. Fullerton (Eds.),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responses to trauma and disaster* (pp.3-27).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rnberg, E. M., La Greca, A. M., Silverman, W. K., & Prinstein, M. J. (1996). Predic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in children after Hurricane Andrew.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5*, 237-248.
- Weisaeth, L. (1996). PTSD: Vulnerability and protective factors. *Bailliere's Clinical Psychiatry,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2*, 217-228.